

从乡村建设到边疆服务

——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

汪洪亮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在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齐鲁大学有乡村建设传统但无边疆学术传统。抗战时期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其边疆研究主要与其主导性参与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该校国学研究所在边疆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与其早年的乡村建设传统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其边疆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及实践取向。

关键词:齐鲁大学;边疆研究;乡村建设;边疆服务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20)02-0036-010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在民国边疆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开展边疆研究较早。华西大学早在1920年代初,即依托华西大学博物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形成了一支中外学者皆有、多种学科并举的边疆学者队伍。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在1930年代上半期,分别形成了以中国文化研究所、禹贡学会为中心的边疆学术团队。齐鲁大学和金陵女大在内迁成都办学前缺乏边疆学术传统。但在华西坝五校联合办学期间,五大学边疆研究得到了协同推进^①。其中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别具特色,主要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具有非常突出的实

践特质。该校顾颉刚教授牵头的国学研究所和“中国边疆学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边疆研究。学界对齐鲁大学的医学、国学及乡村建设活动均有论述,但对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则较为忽略,对其边疆研究与早年乡村建设传统一脉相承的精神关联更是缺乏关注^②。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对其边疆研究及相关问题略作述论。

一、从乡村到边疆:齐鲁大学社会服务的场域转移

齐鲁大学虽然缺乏边疆学术传统,但具有非常

收稿日期:2019-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17ZDA1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季民国时期羌地汉人社会生活与族群互动研究”(17YJC850017)

作者简介:汪洪亮,男,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汪洪亮:《殊途同归: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学术传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② 关于齐鲁大学与乡村建设,可参见赵祥斌:《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张德明:《齐鲁大学龙山乡村实验区乡村建设活动及特点述论》,《齐鲁学刊》2016年第6期。另有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许衍琛:《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马琰琰:《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对此问题亦有讨论。关于齐鲁大学的医学研究,可参见叶大深:《齐鲁大学早期医学教育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周晓杰:《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山东社会(1860—1937)》,山东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关于齐鲁大学与国学研究,可参见朱斌:《民国学术史上被湮没的一页——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述论》,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纯正的乡村建设基因。作为教会大学,顺应教会本身发展的要求,齐鲁大学办学注重社会服务,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体现了那时在华基督教传播注重社会福音的趋向。齐鲁大学重视乡村教育,希望以此造就乡村领袖人才,从而建立起教会在乡村的领导地位。1928年齐鲁大学接受中国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的建议,特别注重乡村及市镇之服务人才的训练,并因此改造为“乡村教育的大学”。那时齐鲁大学就拟建立乡村生活研究院和家庭经济系,在文学院教育系增加乡村教育课程,在社会学系增加乡村生活与乡村经济课程,在医学院增设公共卫生部,在神学院增加乡村教会系和宗教教育系^①。后来文学院增设乡村教育学、乡村经济学、乡村政治学、乡村社会学、农业历史等课程。理学院注重农事试验,聘请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多人充任专家和技术员经营数百亩试验田。《田家半月刊》的创办也是配合乡村计划的。孙天锡、张雪岩、刘龄九等人负责编辑工作^[1](P96-99)。可见齐鲁大学上下一心重视乡村建设,具有身份的认同和实践的自觉。

齐鲁大学社会学系1922年秋即已设立,隶属文学院。不过该系一直与其他系“合并办理”,初与经济系合办,称为社会经济系,1935年与历史系合并,改名历史社会系,分历史和社会两组。乡村社会学是齐鲁大学的一大特色,聚集人才较多,如傅宝琛、余天休等都具有博士学位。该系社会组筹建了乡村建设试验区,拟在济南近郊实施乡村建设工作,如提倡社会教育,改良农业,振兴工艺,推行合作,宣扬卫生,施行诊疗等,皆为试验区主要业务。社会组“历年开设课程”46种,集中在社会学相关学科,虽有边疆课程,但所占比例极低^②。

齐鲁大学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环节都非常重视乡村工作,迁蓉前就已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组织过乡村服务社^③。有学者指出山东乡村建设缘于齐鲁

大学的龙山乡村服务工作。当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得到了齐鲁大学,特别是医学院的支持^④。齐鲁大学与山东乡村建设的渊源及其地位和贡献,我们从既有研究中可窥一斑。

在边疆研究方面,齐鲁大学在移居成都之前并无积累,我们在既有史料中难以看到该校在这方面的作为。但在乡村社会工作方面,齐鲁大学可谓民国时期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先驱,在农业科研、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过突出贡献。这或许只是因为地缘因素,一旦时机便利,齐鲁大学就会因地制宜,如其校长刘世传所言:“边疆问题,本校过去亦曾注意,但以地域所限,未能积极工作,学校移川之后,地接边区,实干之时机已至,于是与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合作,积极推动,该部主任即由本校文学院院长张伯怀先生担任。该部已在松、理、茂、汶及宁属一带,进行边民教育及医疗工作,除在该地设立学校,诊疗所外,并每年暑假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边疆视察团,医疗队等,前往工作。最近拟在宁属西昌设立边疆人员训练所,以期培植夷胞医药人才,俾边民卫生所可得部分的根本解决希望,此事明年可成事实。”^⑤本无边疆学术传统的齐鲁大学抗战时期加入了华西坝边疆学术的大合唱,并且体现出乡村建设的精神特质。齐鲁大学组织边疆服务和参与边疆研究实与其早年乡村建设传统一脉相承,只是因为抗战内迁办学而实现了场域的转移而已。

二、在服务中研究:齐鲁大学边疆工作的路径选择

华西坝时期的齐鲁大学依然重视乡村建设传统,仍在寻觅合适的乡村建设基地。恰好机缘巧合,喜从天降。齐鲁大学神学院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伯

① 罗登修:《齐鲁大学与乡村教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3期,上海: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929年,第72—73页。

② 《齐鲁大学社会学系概况》,《社会建设》(重庆)复刊第1卷第2期,1948年,第80—81页。

③ 《齐鲁大学龙山镇农村服务社工作状况》,《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2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第12页。

④ 参见魏本权、柳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民国山东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另有赵祥斌《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牛和清《民国时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1931—1937)》(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两篇硕士论文可以参考。

⑤ 刘世传:《抗战以来的齐大》,1940年12月于齐鲁大学,参见《齐鲁大学概况及齐大教职员录(1939年度)》,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案卷号:J109-1-302。

怀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青年执行干事,1939年夏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诚静怡在重庆聚议,认为教会工作应覆盖西南边区,决心联合掀起一场以“边疆服务”为宗旨的社会运动^①。

齐鲁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关系至为密切。张伯怀很早就对乡村工作有极大兴趣和抱负,一度主持过中华基督教会山东中四区平民教育事业。张伯怀是边疆服务的提议者之一,在诚静怡遽然离世的情况下,坚持将边疆服务这个“未出世的婴儿”养大。在边疆服务部筹设、服务区开辟、经费筹措及人员延聘等工作中,他都是主持者。要论对边疆服务开创、运行之首功,非他莫属。张伯怀长期担任边疆服务部主任,其继任者崔德润及短期代理者刘龄九均为齐鲁大学教员。工作人员中凡身处要职者也多为山东籍,具有高学历者则多为教会大学毕业。边疆服务部虽然人事体制与齐鲁大学无关,但其人员组配、制度安排及具体事务,概由齐鲁大学主导。尽管华西坝教会五大学都参与了边疆服务运动,但齐鲁大学之角色,非其他四所大学所可比拟。

在对边疆服务部具有指导责任的边疆服务委员会(下设教育、宗教、卫生、研究调查等分委员会)中,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担任委员并兼研究调查设计委员会委员,社会学教授孙恩三担任宗教事工设计委员会主席^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也是边疆服务运动的前期策划人之一。顾颉刚和张伯怀都热心中国边疆与边政问题,在各自牵头的边疆事务中积极参与,互为支持。张伯怀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中国边疆学会并担任理事,顾颉刚参与筹备边疆服务部成立事宜,应邀担任边疆服务研究调查设计委员会成员,并受张伯怀之托创作了“边疆服务团团歌”,曾在川康边疆服务区域广为传唱^③。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工作内容大致可分为实地服务和实地研究。张伯怀认为:“调查研究是决定服务方针的根据,可以解决服务时的许多困难”^④。他要求每个服务区的实地工作“尽量与当地、中央及地方机关合作”,调查研究方面“尤应尽力与附近之学术机关合作”,敦促服务人员在“自己本行的事情之内作进一步的尝试”,“附带的作调查和研究工作”^⑤。如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可调查当地疾病情形、治疗方法及其应用之器械药材;从事宗教工作可搜集当地节庆、民间信仰;从事社会工作可调查民歌民谣、民风民俗、民间故事、民众游戏与娱乐;从事生计工作可研究当地农工商业及工艺制作情形^⑥。张伯怀三令五申加强研究工作,这既是工作所需,也与其本人就是高校学人,具有强烈的研究意识有关。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者均认为边疆服务区是最为理想的边疆研究场所,因藉服务而与边民建立联系,可使调查研究事半功倍。如李安宅所言,边疆服务应该由一个“富有机动性的团体”来组织实施,这个团体应是个包括医学家,社会学家,矿物,土壤学家,畜牧、林艺学家,语言学家在内的各类专家组成的“边疆文化团”,这些专家在边疆“即学习,即同化,即服务,即表证,即改进,即扶植,分工合作,比较参证,勿忘互助,名利不居,以使边民归于自助自动之途”,“既可以吸引内地学者,亦可提拔边地青年”;对边地青年,要么资助进修,要么让其陪同内地学者“共同研究,长久接触,则彼此启发,本末分别,沟通文化,自易水到渠成”^{[2](P73-78)}。实际上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者们参与边疆服务大体就是采用了李安宅所言模式。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参与边疆服务部所作边疆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服务于边疆服务的

① 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上海市档案馆藏资料:《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苏州),编号:U102-0-16。

②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民政厅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编号:54-1-2。

③ 参见汪洪亮:《顾颉刚与中华基督教会在西南边疆的社会服务运动——以顾颉刚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

④ 张伯怀:《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报告》(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在成都广播电台广播),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发行:《协进》复刊第2期,1943年,第21-22页。

⑤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川50-436。

⑥ 张伯怀:《本部同工应有的心理建设》,《边疆服务》第26期,1948年,第4页。

应用性研究,二是学者们根据自身专业特长因地制宜所做的基础研究。前者集中在医疗和卫生方面,后者如边疆语文、民俗、宗教研究,对于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了解和尊重边民、拉近心理距离提供了较大帮助。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因为办学层次主要是小学和幼稚园教育,形式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基本能够胜任。在福音传播也就是传教工作方面,办学宗旨已经世俗化和本土化、教师群体多为中国人的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较少介入。在医疗卫生和生计工作方面,边疆服务有赖于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教授们的指导和参与。其中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基本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多以实地调研形式进行,并以服务边区民众为导向,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

医疗工作在边疆服务中常起到敲门砖作用。用齐鲁大学《田家半月报》编辑刘龄九的话说,就是边疆服务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前期工作中“应该算是第一件要紧的事”^①。边疆服务开展之初,卫生工作举步维艰。工作人员即认识到边地疾病流行,死亡率高,边民传统医药观念很难打破。怎样打开被动局面?边疆服务部选择了“技术攻坚”,特聘医学界专家对边地某些疑难病症做病理研究,为有效施诊奠定坚实基础,取得边地民众信任,使卫生工作带动其他工作开展创造了条件。

据档案资料显示,齐鲁大学计划辅助边疆服务部建设医疗设施,先在川康服务区各设中心保健院或医疗院一处,再在每区增设两个分院,经费由边疆服务部筹措,院长由双方商选;暑期由齐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带队,选择高年级学生组织卫生医疗队到服务区作“卫生教育及医疗工作”;专家调查地方疾病,边疆服务部协助搜集标本材料^②。1940年边疆服务

部联合齐鲁大学医学院,由院长张剑涛、教授张冠英、张伯怀领队,组织了到西康宁属地区作医疗和调查工作的暑期边疆卫生队^③。1941年,边疆服务部计划与医学院合作在西昌开办一个中心医院,两个卫生院,三个卫生站,四个卫生队^④。1942年,边疆服务部与医学院合组边疆卫生队,到西昌等地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因为正值雨季、路途遥远,到西昌不久即折回成都^⑤。借助边疆服务部及齐鲁大学医疗资源,西昌卫生院1944年扩建为中心医院^⑥。基于“欲求医术之进步,必须与医学团体有密切联络”,西昌医院请医学院“轮流派遣医学专家来医院工作,一方研究本地及附近危及民众健康之疾病,同时并可协助训练各级医护人才”^⑦。

边疆服务部卫生调查研究工作多系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发现边地病情,而后由华西坝教会大学专家率队调研,而后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循例跟进。如边疆服务部发现川西眼疾普遍,“十人九病”。1944年9月,齐鲁大学眼科教授陈耀真与医师汤佩青,边疆服务部所派之马锡山、孙自宽、李长珍等组成医疗队前往诊疗,“兼作科学考察”,后陈耀真、汤佩青写成《川西北眼疾调查之经过》,提出了预防及治疗措施。在川康民族地区行医治病过程中,边疆服务部发现多种流行地方疾病,如黑热病、回归热、甲状腺肿大、肠寄生虫等。1943年夏,侯宝璋应边疆服务部邀请指导调查边民的食道疾病^⑧。1944年夏,侯宝璋及医师孙绍廉偕同边疆服务部卫生人员,为研究黑热病分布情况,“亲赴威州理番茂县等处作实地调查,往返一月”^⑨,并沿路调查一般疾病状况,发现这一带黑热病的传染媒介是一种叫白蛉子的昆虫^⑩。医学界认为侯宝璋的研究发现是“病理学上一

① 刘龄九:《本部卫生工作简单介绍》,《边疆服务》第7期,1944年,第1页。

② 《边疆服务部二十九年五六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649-336。

③ 《成都大学生暑期服务团徒步出发》,《田家半月报》第7卷14期,1940年,6页。

④ 《边疆服务部西康区卫生事工新计划》,《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4期,1941年,第10页。

⑤ 《边疆卫生队成功归来》,《田家半月报》第7卷第17期,1942年,第6页。

⑥ 《工作报告·西康区卫生工作一瞥(1944年1-10月)》,《边疆服务》第7期,1944年。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边疆服务部二十九年五六月工作报告》,案卷号649-336。

⑧ 《本部近讯(川西区近讯)·调查特种疾病》,《边疆服务》第4期,1943年,第19页。

⑨ 《四川的黑热病之调查》,《现代医学》第1卷第1期,1944年,第25页。

⑩ 《工作简讯(总部)·调查川西区重要疾病》,《边疆服务通讯》第1期,1945年。

新贡献”，“世界病理学家对于此发现颇为重视”^①。后来侯宝璋发表了《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阐述了边区多种病症产生的原因及应采取的治疗措施^②。边疆服务部卫生工作人员在专家指导下，提升了业务水平，在边区特种疾病调研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马锡山对“黑热病”的发现，即为显例。他发现松理茂汶一带儿童死亡率高，当地将其归因于“恶浊”，“商请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侯宝璋前来作该病病理研究，并请成都华西齐鲁联合医院代为查血诊断”，后因国际救济委员会赞助购得显微镜，确诊7例黑热病患者，发现病原体寄生虫中华白蛉，证实中国黑热病分布不仅限于北方。在其撰写的研究报告中，马锡山分析了黑热病在汶川、理番、茂县三县的发布及其病原、症状与诊断方法^③。

因应边疆服务工作需要，齐鲁大学对川康边区社会文化研究也较为关注。张伯怀借调研边疆服务工作之机，颇为关注边地社会尤其是民众信仰问题。他认定川西第十六行政区包括汶川、理县、茂县、松潘、靖化、懋功等地，是“四川的边区”，“那里的居民是四川的边民”。他用三句话界定了川西的重要性：一是“四川的重要富源”，木材、药材及各类工作原料丰富；二是“四川的重大担负”，川西“寇盗烟匪”猖獗，各县行政费用、治安责任及军警费用均由四川省负担；三是“四川的特别机会”，川西界于川康甘青四省之间，但交通及经济往来“几乎完全以四川为主体”。他强调要做好川西边疆服务工作，先要“举目观看”，“看一看这里都是有些什么人，他们的风俗、习惯、环境、个性、问题、需要和我们工作的机会”。他认为川西羌人勤劳和平，与汉人“关系最久，而距汉人范围最近”，“无兵无匪，不刮不乱”，无争而俭朴；在政治早已改土归流，“久隶汉籍”，但生活习惯宗教习惯保持其“本来面目”，且因“安土重迁”和“缺乏文字”，彼此联系较少，“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张伯怀最关注的还是羌民信仰状况，希望在基督教福音工作上打开局面。羌民系多神信仰，除了天、地、山、水为共拜之神外，每个寨子还有地方性甚

至家庭性的神灵。张伯怀认为“因为缺乏了高尚的宗教信仰，羌人的生活进步很少”，“羌人很需要高尚的福音，而且也比较的容易接受福音”。张伯怀对四土五屯及黑水地区社会均有考察，但多从福音传播角度出发，如他注意到理县“嘉戎民族”信仰喇嘛教之“虔诚形式令人钦佩。惟重习为而轻教训，故近乎迷信，对于社会进步人生幸福殊多障碍。倘能以福音真理予以感化对于其公私生活必多利益”^④。这些观察固然不错，但以基督教福音为高尚，欲以基督教来取代羌民原有的信仰系统，则不太符合宗教信仰自由之本义。

刘龄九介绍了“古代的羌民”、“今日的羌民”，对川西羌民信仰也有考察。他认为羌民信仰鬼神，最高保护神为白石神，代表天地，其次为树林神，宗教领袖为端公。他注意到，端公在羌民生活中居于“最重要的领导地位”，“他记得羌民的历史，他能同鬼神来往，他能治病驱鬼，他能转移人的穷富祸福。凡任何公共集会尤其是有关祭祀的行动，都由端公主持，所以端公是羌民精神上的实际统治者”，也就是说，“端公是专门性质的巫师，但并不是一种固定职业”，平时还是以耕牧为生。刘龄九对羌民优点的概括值得重视。他认为羌民“忠厚”，“体格高大，强健，农耕樵牧，不分男女”，“为人朴实诚恳”，“农忙时，共同操作，互相帮工，不取工资”，“敬老尊长，遇有问题，悉由老年人会商解决”，“男女平等，生活均能独立”，“无土豪劣绅，无烟赌盗匪”。刘龄九还对基督教在川西边地传播历史作了考述，认为“基督教传进羌民区域中，远在三十年前，但过去的关系，只限于汉人中间，基督教正式同羌民发生关系，是在民国二十八年的冬天，即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开始工作以后。首先在理番的佳山寨开办学校，后又到汶川的萝卜寨。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但是羌民在生活与思想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动”。刘龄九对羌民的将来也有设想：“今日的羌民同汉人最大的差别，要算是较特殊的服饰与完

① 《病理学上一新贡献：齐鲁大学教授侯宝璋发现黑热病传染媒介》，《西南医学杂志》第4卷第2期，1944年，第28页。

② 侯宝璋：《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边疆服务》第7期，1944年。

③ 马锡山：《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边疆服务》第7期，1944年，第14—15页。

④ 张伯怀：《四川教会与川西布道》，《希望月刊》第19卷第2期，1947年，第1—2、20—21页。

全不同的语言。服饰的改变自然容易,就是他们的言语,也因为没有文字的关系,功用早已越来越小,相距几里的寨子便有不同的语调,便不能交换意见,现在小学的学生,多已不能用羌语畅所欲言了。如果能积极的施以教育,不久的将来,羌语会自然淘汰,羌民会完全同化,‘羌民’也就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①

刘龄九的“同化”并不足取,那时学者已有提出中华各族间宜走向“共同的近代化”,而非强人就己的单方面的取代或改造^②。边疆教育的目的也不在于淘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而在于增强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获得现代社会所需知识。据以后见之明,刘龄九这一针对未来的论述显然落空,但其所见“现状”仍是较为客观的。他在边地做边疆问题讲座,当时媒体报道:“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秘书刘龄九先生于三月八日周会时来校演讲,刘先生详述边疆地区同胞生活之艰苦情况及边疆服务队举办之福利事业,并带来图片数十幅,供大众展览,该项图片均在边疆实地摄影,给予大众深切认识。”^③

崔德润担任川西区部主任七年,对“边务”问题有切肤之痛。他对土司制度造成的“黑暗政治”极为不满,认为“今日民主之风弥漫乎全球,而吾国边地之土司,仍如专制之君王”。他提出,要根本解决“边务问题”,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积极作为^④。他认为“四土问题的中心在苏永和,他是有野心,有实力的边民领袖。但他的思想很落后,他的心目中只看到他一人一家的利益,而没有认识清楚现在国家的情形,他一心要当太上土司。”崔德润以清代金川之役为史鉴,指出苏永和势力不弱于当年金川土司,全靠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根本之计还是要“发展交通,从事教育文化经济的建设,提高文化水准,改善

人民生活,加强政治训练,使边民变成现代的中国国民,使边地变成真正的中国领土”^⑤。崔德润为写出这篇报告,曾翻阅“关于黑水三番的文献”及地图,1946年随理番县长徐均良视察,历时32天^⑥。崔德润发现当地不知民国,只知满清,不由感叹:“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竟还有成千成万的清朝遗老;民国成立了三十多年,还有人说‘当今皇上万岁’”,认为“为政之道,在制先机”,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发展交通和教育,提高当地经济与文化,改进人民生活,加强政治训练,此法“虽似劳而拙,却是根本的办法”^⑦。

顾颉刚在其创作的《边疆服务团团歌》中写道:“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这是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的一贯立场。边疆服务部对民族平等与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心领神会,强调处理边政应具“汉夷平等、四海兄弟”的意识。张伯怀提出:“我们不存着许多国人‘重汉轻夷’,和‘用夏变夷’的心理……我们希望完成的三部曲是:化除双方的芥蒂,增进双方的友谊,团结双方的实力,以创造快乐的边区。因此我们的实际工作必须让双方都有参加的机会,而在共同事业上增加相互的认识。”^⑧

齐鲁大学的学生也参与到边疆服务运动中。边疆服务部每年暑假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一般由教会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主体,边疆服务部人员陪同,到川西区和西康区实地服务和调查研究。相对于他们的教师,学生参与调研的范围更为广泛。据笔者梳理,齐鲁大学参与的暑期服务团情况如后。1940年夏,齐鲁大学与华西坝上华西、金陵、金女大等教会大学及中央大学、铭贤农学院等教职员16人、学生81人,以华西大学教授蒋翼振为团长,齐鲁大学副教授崔德润为副组长,赴茂县、理县、汶川藏羌村寨作抗战宣传、医疗卫生、农业推广及社会调查

① 以上所引刘龄九的论述均出自其《闲话羌民》,《希望月刊》第17卷第7期,1945年7月,第2—5页;《闲话羌民》(续),《希望月刊》第17卷第8期,1945年8月,第5—8页。

② 张汉光:《边政往何处去》,《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年,第17—23页。

③ 《教导要闻:刘龄九讲边疆问题》,《培英中学西关分校校刊》第7期,1948年,第5页。

④ 崔德润:《四土纪行》,《边疆服务》第19期,1947年,第25页。

⑤ 崔德润:《理番县的边务问题》,《边疆服务》第15期,1947年,第4—5页。

⑥ 崔德润:《黑水三番旅行记》,《边疆服务通讯》第15期,第7页。

⑦ 崔德润:《黑水三番旅行记》(续),《边疆服务》第17期,1947年,第17—18页。

⑧ 张伯怀:《本部同工应有的心理建设》,《边疆服务》第26期,1948年,第5页。

等工作,历时六周^①。同期张伯怀组建暑期边疆卫生队,到西康宁属边区开展巡回医疗及疾病调查工作,参与者主要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②。次年夏,齐鲁大学与金陵大学、金陵女大、中央大学、国立边疆学校及江苏医学院等校教员 10 人及学生 47 人赴川西北理县,其中考察组 20 人,考察事项分文化、经济、农林畜牧、地理、生物、医药卫生等 7 类,后来调研报告还汇编成《川西调查记》,由教育部出版。教育部提供了 5 万资助,并由边疆教育委员会秘书王文萱担任团长,崔德润担任总干事^③。1942 年夏,由齐鲁大学教授、《田家半月报》编辑张雪岩带队,服务团分两组,由华西大学教授植物学教授胡秀英率领其中一组考察川西植物及畜牧,其他则参与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张雪岩、医学院教授栾汝璉,金陵女子大学地理学教授刘恩兰、华西大学植物学教授胡秀英等任教,崔德润担任教学实习指导。1946 年暑期,边疆服务部特约齐鲁大学在读学生孙家俭在理县举办民众图书室和夏令儿童读书会,持续时间达 3 个月^④。

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是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大特征在于边疆研究与边疆服务实现了有机融合。张伯怀注意到,虽然那时关注边疆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但是“志在深入边疆,以服务为目的之团体依然不可多见”。在他看来,“对于边疆的研究真实可靠,非以服务为基础不可”^⑤。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体现了张伯怀提出的原则,其服务区域即其调查研究区域,其服务方式即其调查研究方式,而且带动学生和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人才。按华西大学教授李安宅的观点,就是形成了“研究服务训练合为一体”的突出特色和优

势。“边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边疆服务”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宣传性”。

三、从文献到实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的边疆偏好

国学研究所是抗战时期齐鲁大学边疆研究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不过在济南办学期间,该所并不关注边疆研究。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相比,齐鲁大学国学所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产出能力都有很大差距,审时度势之下研究所将齐鲁文化研究作为国学研究所的研究重心,故其产出较多文史研究成果,但多停留在校注和集解^⑥。后来哈佛燕京学社认为在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可以作为研究型大学,其他教会大学则应专注本科教学工作。本已式微的国学研究在华西坝期间逆势崛起,与张维华邀请顾颉刚来校主持有关^[3](P201-208)。顾颉刚来成都后,本来踌躇满志,但因工作理想与齐鲁大学所能提供的条件有些差距,加上其老领导——他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期的副校长、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召唤,顾颉刚在抗战时期多数时候在重庆。国学研究所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搜集整理资料。顾颉刚列出了一揽子计划,包括编纂《中国民族史料集》《中国边陲史料丛书》等^⑦。研究所四处采购图书资料,其中就有边疆研究所需图书。“本所自山东迁来,图籍缺口,重建以来,七八月中,多方采购”^⑧,但经费有限,地方偏远,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采购不易;边区文献常非国语写就,缺乏翻译就如同天书^⑨。图书编纂工作,“已在进行中者,有中国民族史材料集,先后就正史、别史、经子、方志、金石、及外国撰述中整理出其有关中

① 参见《边疆服务部学生暑期服务团筹备委员会与四川省卫生处处长陈志潜的往来函件》,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卫生处档案,全宗号:民 113,案卷号:30。

② 《成都大学生时期服务团徒步出发》,《田家半月报》第 7 卷第 14 期,1940 年,第 6 页。

③ 行政院新闻局印行:《边疆教育》,1947 年 10 月,第 10—11 页。

④ 家俭:《理县夏令儿童读书会记》,《边疆服务》第 12 期,1946 年,第 22—23 页。

⑤ 张伯怀:《服务运动之重要》,《边疆服务》第 2 期,1943 年,无页。

⑥ 参见《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 1934 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案卷号:J9-3-3,第 2—9 页。

⑦ 《齐鲁大学重建国学研究所》,《读书通讯》第 9 期,中国文化服务社读书会,1940 年,第 8 页。

⑧ 《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概况》,《史学季刊》第 1 卷第 1 期,史学季刊编辑委员会,1940 年,第 136 页。

⑨ 本段参见李鉴铭:《西康通讯六则》,《责善半月刊》第 1 卷第 16 期,1940 年,第 19—22 页。

国民族史之材料,并为作表注及索引等,分类编纂,其他有中国学术史材料集,中国宗教史材料集,中国边疆史料丛书,皆在计划进行中”^①。

二是倡导实地考察。1941年,黄和绳受顾颉刚之命将在西康的旅行见闻写成《西康旅行记》^②。江应樑在顾颉刚支持下考察凉山,并分别从学术立场和实际问题角度提出开发凉山和“开化”“罗罗”问题^③;刚来四川不久的杨向奎受顾颉刚嘱托,实地考察了李冰和二郎神的故事^④。李鉴铭发表了介绍西康地区宗教分布、土著康人的神话传说、婚俗、日常生活习惯、假日节庆的《康俗杂记》^⑤;李得贤撰文介绍了青海省的民风信仰、神话传说、山川物产^⑥;王树民根据实地考察经历撰文介绍甘肃风物^⑦。

三是成立中国边疆学会。1941年3月1日,中国边疆学会成立大会隆重举行,到会人员85人,顾颉刚被选举为该会理事长。据当日顾颉刚日记,当日与会者有85人,主体就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者,其中就有侯宝璋、张维华等齐鲁大学教授^⑧。此前已有两个同名学会分别设在重庆、榆林。国民政府社会部以三个学会同名要求三会合并,总会设在重庆。顾颉刚在1941年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社会部以‘中国边疆学会’已有赵守钰之组织,令改名。又谓总会应设重庆,此大给我辈打击。”此事实反证了政府层面对边疆研究的重视。合并后的中国边疆学会以赵守钰为理事长,顾颉刚、马鹤天等为常务理事,张伯怀、姜蕴刚等为理事。1946年,中国边疆学会迁回南京,后因赵守钰主持黄河委员会,中国边疆学会推举顾颉刚为理事长。1942年3月20日,中国边疆学会以副刊形式在《党军日报》发行《边疆周刊》,主要针对西南边疆问题及治理,发表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边疆研究成果。或因系报纸文

章,大多并不太长,其中既有严谨的学术研讨,也有边地民风的记录,但都与边疆问题有关。顾颉刚主持编辑的《责善》半月刊也发表了不少与边疆问题有关的论文。

四、一以贯之:齐鲁大学边疆研究的精神传承

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在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具有独特个性,尤其表现在其在服务中研究的应用特性。抗战时期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的边疆研究,基本以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为学科背景;金陵女大以刘恩兰为代表的边疆研究则以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为学科背景。齐鲁大学虽然在抗战前没有边疆学术传统,在华西坝办学时期其边疆研究看似平地青云,异军突起,实则有其精神传统,那就是立足于服务社会,着眼于改造社会。齐鲁大学组织边疆服务和参与边疆研究实际上与其早年的乡村建设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因为抗战内迁办学而实现了场域的转移而已。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兴起了旨在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经济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近700个团体投入其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也竞相提出,最有影响者当属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主张。但在晏阳初看来,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前锋、民众解放运动的首创者,“乃是那一班筚路蓝缕,开创基督教道的初期宣教士”^⑨,这并非晏阳初谦恭承让。基督教被乡村建设领袖人物推举为乡村改造运动的前锋,于史有据。

乡土中国是基督教最为关注的需要改造的“社会”。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的兴起,在中国自然就要

① 《齐鲁大学近讯》,《科学新闻》,511页。

② 黄和绳:《西康旅行记》,《责善》第1卷第21期,1941年,第20—23页。

③ 江应樑:《大小凉山之行》,《责善》第2卷第13期,1941年,第9—20页。

④ 杨向奎:《〈李冰与二郎神〉自序》,《责善》第1卷第19期,1940年,第4页。

⑤ 参见李鉴铭:《康俗杂记(一则)祝呢打禾》,《责善》第1卷第23期,1941年,第22—23页;《康俗杂记(四则)天菩萨》,《责善》第1卷第24期,1941年,第16—18页;《康俗杂记(一则)新年同乐》,《责善》第2卷第12期,1941年,第20—21页。

⑥ 李得贤:《青海杂话》,《责善》第2卷第13/14期,1941年。

⑦ 王树民:《陇岷日记》,《责善》第1卷第2/3/8/9/10/14期,1940年。

⑧ 本文引用《顾颉刚日记》,均出自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下同。

⑨ 孙恩三:《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呐喊》,《中华归主》第138期,1933年,第3页。

把福音传播到乡土社会中去,乡村建设也就成了基督教传播社会福音的重要载体。正如教会人士认为,中国社会的真面目就在乡村,要建设新中国也得先认真地建设好乡村,故基督教应投入乡村建设运动^①;过去教会工作虽然注意到到乡村,但工作停留在布道传经,并没有提高乡村整个生活的计划^②。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东部地区很多沦陷,“教会遭受空前损害,事工多停顿,或改变方式,苟延残喘,产业受轰炸毁坏或占住封闭,教友多流离四散,即或存余,亦贫不自存,成为普遍灾荒”^③,但在大后方的乡村教会,则仍能照常工作^④,而且大后方及边地乡村经济社会呈现的残破面貌,又使教会人士找到了新的努力方向。张伯怀强调:“今日农村已成崩溃的颓势,挽救亟须更大努力。教会如果习于故常,偏重城市,苟安城市,无决心加紧在广大农村,继续不断,下苦功夫,福音决难在中国土地上扎进深根。”^⑤很多教会干部和信徒也流亡到大后方,几所教会大学迁到成都华西坝,客观上为基督教乡村建设工作提供了干部基础和专家队伍。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审时度势,随即开辟西南宣教事工。所以基督教传教事业应实现从城市向乡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转移,是那个时期中国基督教会的必然选择。齐鲁大学对乡村建设如此重视,而后在华西坝办学期间积极开展边疆服务与边疆研究,自然是基于对在华基督教事业发展趋向的认知而做出的选择。所以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有明显的乡村建设渊源,只是其服务的乡村处于西南边疆而已。

齐鲁大学自创校起就一直重视乡村建设工作,在教育、卫生、生计领域都有诸多实践。1935年刘世传接替朱经农担任校长,进一步加强了乡村建设课程。教务主任孙恩三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乡村干事,抗战时期还在重庆与晏阳初合作,负责

璧山乡村建设试验区,并担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主任,与实业家卢作孚也成为好友,被聘为民生公司顾问。孙恩三在齐鲁大学工作期间和张雪岩一道主持的《田家半月报》就以乡村建设为主要内容。该刊并非边疆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主要内容是反映农村生产生活,对基督教的传播、农村社会的改良和宣传抗战救国有一定的影响^⑥。但因地处华西,该刊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在川康地区的边疆服务和边疆研究比较关注,发表相关信息报道40余篇。编辑刘龄九还曾短期代理边疆服务部主任。

齐鲁大学医学在抗战时期边疆研究及边疆服务运动中有着突出表现。如医学院侯宝璋教授就加入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且曾担任会长一职。1946年该学会材料提及:“过去八年里,学会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学者,得到很大荣誉和利益。学会特别荣幸拥有齐鲁大学的侯宝璋(Hou Pao - chang)教授……他们不仅积极推进了华西研究,而且对学会有极大的兴趣与关心。”^⑦1939 - 1950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共选举产生22位正、副会长,来自美、英、加、中等国,11名会长中,中国学者有5位:方叔轩(1939 - 1940)、侯宝璋(1942 - 1943)、李安宅(1943 - 1945)、刘承钊(1946 - 1947)和蓝天鹤(1948 - 1949)。其中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多次担任正、副会长,除了侯宝璋为齐鲁大学教授外,余皆为华西大学教授。医学院在配合边疆服务部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在西南地区疾病的调查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组织边疆卫生队外,齐鲁大学医学院师生常在《田家》半月报等报刊发表医疗卫生知识科普文章。《田家》还特约医学院为“医药问答”和“卫生副刊”专栏供稿。侯宝璋还组织创办了医学季刊《现代医学》,对西南地区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给予了较多关注。

齐鲁大学在边疆服务中加强边疆研究,充分发

① 维之:《读〈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天风》第5期,1938年,第10页。

② 张福良:《编者的话》,载于包德斐《基督教乡村建设》,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2年,第2页。

③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第51页,上海市档案馆藏:U102-0-16。

④ 余牧人:《中国乡村教会事工的回顾与前瞻》,《金陵神学志》第23卷第4期,1948年,第51页。

⑤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总部会议记录》,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建川50-436。

⑥ 参见王京强:《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田家半月报〉》,《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⑦ “Secretary Writing”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1,6,B,(1946),P222.

扬其乡村建设传统,发挥其医学等学科优势,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边疆研究之路。余牧人说边疆服务是“教会中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种新工作,对教会,对国家,都有莫大的贡献”,代表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①。《中华年鉴》也将边疆服务作为“乡村建设”的典型进行了介绍^②。再考虑到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牵头成立的中国边疆学会,齐鲁大学对那时华西坝边疆研究的辐射能力,不难想象。所以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理应在民国

时期边疆学术史上留下印痕。

参考文献:

- [1] 张士新.我所知道的齐鲁大学[A].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C].济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
- [2]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M].上海:中华书局,1944.
- [3]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杨春梅

From Rural Reconstruction to Frontier Service:

—Frontier Study of Cheeloo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NG Hong-liang

(History Culture Colleg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Cheeloo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fiv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of Huaxi Ba and which has the tradition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but no frontier academic tradi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eeloo University moved to Huaxi Ba in Chengdu, and its frontier research was mainly carried ou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leading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Frontier Service Movement.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has also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frontier research. The frontier service led by Cheeloo University has a spiritual connection with its early rural Reconstruction tradition, and its frontier research has distinct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Key words: Cheeloo University; frontier study; rural reconstruction; frontier service

① 余牧人:《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基督教丛刊》第9期,1945年,第9页。

② Chi-hsien Chang, *Religion,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40-1941), The Commercial Press, TTD, China, p89.